



# 伊斯兰革命后伊朗社会分层结构探析

韩建伟

(西北大学 中东研究所,陕西 西安 710069)

**摘要:**受一系列因素的影响,革命后的伊朗社会分层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总体上带有回归传统、反资本倾向、国家全面介入和分化严重等基本特征。这种状况完全不符合伊斯兰革命的最初理想,并最终危及到伊斯兰政权存在的合法性。

**关键词:**伊朗;伊斯兰革命;社会分层结构

**中图分类号:**K37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0)04-0138-04

社会分层理论研究的是人们的利益、地位差别及不均等、不公平、不公正现象。<sup>[1]</sup>一定时期内社会分层结构是否合理,是影响该国政治稳定和前途命运的重要因素。尤其当社会越来越作为独立的力量影响政府运作的时候,其分层的合理化越显重要。到巴列维王朝后期,伊朗的社会分化程度空前严重,加剧了社会对抗并最终导致王朝覆灭。而伊斯兰革命带有强烈的民粹主义价值取向,革命后的政府试图建立一个全民平等的社会,但现实却不能契合理想化的诉求。本文试图通过考察伊斯兰革命后伊朗的社会分层结构,为理解革命的社会影响、政治变动的社会化效应、社会与经济政策的后果等问题奠定基础。

## 一、影响革命后伊朗社会分层结构变化的主要因素

第一,任何革命都会引起社会阶层的变化,作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事件之一,伊斯兰革命也不例外。革命推翻了巴列维王朝的统治,建立了由什叶派宗教领袖为首的政府。围绕这一政治变化,社会力量重新分化组合。原有阶层或地位上升,或被消灭,或被边缘化,同时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阶层。

第二,革命后不同时期的经济政策对各阶层分别产生了不同影响。革命后的最初十年(1979—

1989)——霍梅尼(Khomeini)时期经济政策的主要特征是强调公正,建立国家对资源的再分配体制。再分配体制本质上属于相对平均主义的范畴,一般来讲它具有整体改善社会阶层状况的效果,但其最终影响往往比较复杂。在霍梅尼去世之后,伊朗开始进行私有化改革,一些再分配政策如价格控制、配给、补贴等都被废除,这重新引起了社会阶层的分化组合。

第三,持续性经济危机的影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国际制裁,长达8年的两伊战争爆发,加上国际油价的大幅下跌,使伊朗面临严峻的外部环境。另外,革命导致的大量资本外逃;政府内部派系林立;经济社会政策屡有失误。诸多因素使得革命后的伊朗面临空前经济危机,这深刻影响到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尤其是中下层。

## 二、革命后伊朗社会分层结构变化的主要表现

总体来说,革命后的伊朗社会仍是城乡二元结构。革命前夕,伊朗有52%的人口是农民和游牧民,48%的人口是城市居民。而到1997年,农业人口仍然占全部人口的近40%,人数在2800万左右。<sup>[2](P83)</sup>而同时,游牧民的重要性日益下降,越来越多的游牧民转为定居人口。1986年,全国还有

收稿日期:2009-02-19;修回日期:2010-05-06

基金项目:2009年西北大学研究生自主创新基金资助项目(09YZZ19)

作者简介:韩建伟,女,山东广饶人,西北大学博士生,从事中东经济与社会史研究。

180 万的游牧民,占全部人口的 3%,但到 90 年代中期,部落和游牧民已经不再是伊朗社会的重要阶层了。<sup>[2](P85)</sup> 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正在发生改变。总的来说,革命后伊朗的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取代旧的特权阶层的是另一个统治精英集团,从而构成了新的上层社会。在革命前,王室成员、政府官员、获得各种政府支持的大工业金融资产阶级以及大地主阶层,是巴列维王朝的主要社会基础。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这个阶层,大部分成员或逃亡国外,或遭监禁、杀害。革命后的政府形成了以什叶派宗教领袖为首的比较封闭的统治集团,高级神职人员,尤其阿亚图拉,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另外,与之有密切联系的政府官员、大商人(主要指巴扎商人)、革命组织(主要指各种基金会)以及军事组织的上层,构成了统治集团的外围。他们利用政治资源牟取利益,其中很多都是垄断性企业的代理人,从而成为官僚资产阶级的主要部分。虽然建立了共和国,但家族政治仍对伊朗社会有广泛影响力。

第二,一个庞杂的城市中产阶级队伍的形成。“中产阶级”是现代经济发展导致的社会分层复杂化的产物。一般认为这个阶层接受过良好教育,大多从事脑力劳动者,主要靠工资及薪金为生,具有较强专业知识和职业水平,有一定消费能力,而且能够在解决生存问题的前提下进一步提高生活质量。所以,中产阶级人数的增多往往意味着一个社会稳定性的加强。但是中产阶级本身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关于其划分标准也存在较大歧义。

革命后的伊朗形成了一个既不同于少数特权阶层,又不同于资产阶级和产业工人的“中产阶级”阶层。这一阶层的重要部分首先是企业的经营管理阶层及科技人员,其次是政府专业人才及行政管理人员。到 1986 年,私有部门的经营管理阶层和科技人员减少了 37.2%,人数从 10.2 万减少到 6.4 万;而同时国有部门的同类人员从 37.6 万增加到 71 万。<sup>[3](P106)</sup> 这显然是革命后初期国有化政策推行、私有部门大量收缩的结果。而 90 年代的重大变化在于私有部门中产阶级比例的明显增长。和 80 年代相比,私有部门中产阶级总人数增加了 3 倍(21.9 万),占有所有中产阶级的 14.7%。<sup>[3](P115)</sup> 这表明在私有化改革之后,私有成分在经济中的比重明显增加。

中产阶级人数最多的是国有部门的技术型或专业型人才,如教师、医生和护士等;其次是国有企业的技术性人才和政府中层行政管理人员;而最后是

私有企业的技术雇员。他们又都可称为现代中产阶级,而大量神职人员构成了传统中产阶级。革命后,神职人员地位明显上升。他们一方面依靠清真寺获得较高收入,同时也经常成为各地司法、行政、教育文化及社会慈善事业的主要负责人。

总体来说,中产阶级一般有技术专长,或者与政府关系密切,有较为稳定的地位和收入,处境要好于普通劳动阶层。

第三,城市资产阶级和产业工人的数量锐减,同时形成一个庞大的个体经营者阶层。

这里的资产阶级,主要指私营资产阶级,区别于上面提到的官僚资产阶级。革命消灭了原来的大资产阶级,但并没有培育出一个新的成熟的资产阶级队伍。随着大量企业被收归国有,尤其是大型企业,大资产阶级失去了得以生存的经济基础。革命后初期的资产阶级主要指中小企业主,而小企业主又居多数。我们从企业规模上可见一斑。在 1976—1986 年间,小企业(1—9 个工人)不论在数量、产量还是人均产出方面的比重都相对提高,而中等企业(10—49 个工人)的地位在下降。资产阶级平均拥有的雇员人数从 1976 年的 16.9/人降至 1986 年的 5.5/人。与此同时,私有企业工人数量急剧下降,减少了大约 64.8 万人。而且大多数分散在不超过 10 人的小企业中。但国有企业的工人数量增加了 32.6 万人,增长率达 57.6%。<sup>[3](P102)</sup> 但这并没能抵消产业工人比例的整体下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个体经营者形成一个庞大的阶层。同一时期新增加的劳动力的 2/3 都成为自食其力的个体经营者。

20 世纪 90 年代后,随着资本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的恢复,资产阶级和产业工人的数量有了新的增加,而且企业的规模有所扩大。如资产阶级的数量从 1986 年的 20.6 万人增加到 1996 年的 38.5 万人,而私有企业的工人增加了将近一倍,约 211.6 万人。但国有企业的工人仍是产业工人的主体部分。同时,个体经营者比重仅有微弱下降,从 29.3% 降为 28.8%。<sup>[4]</sup>

总之在革命后,大多数资产阶级的处境恶化,处在极不稳定的形势之中。很多资本家十分贫困,其处境并不好于个体经营者或工薪阶层。在个体经营者队伍中,只有很少部分从事律师、医生等现代职业,大部分从事传统行业,如销售、手工制作等部门。可以看出不论在国有化还是私有化改革时期,资本关系的萎缩都是非常严重的。革命和国有化运动使私人资本处于极不安全的环境之中,而缺乏明确的没收标准更加恶化了这种形势;经济形势的总体恶

化又给私人资本的扩大再生产造成严重困难。虽然之后的私有化改革取得一些成效,但是资本市场吸收劳动力的能力仍十分有限,大量人口只能靠个体经营解决生存问题。

第四,城市贫民大量存在,失业及半失业人口是其主要来源。革命后持续经济危机和人口的迅猛增长造成失业率居高不下。1976—1986年,城市失业率从5.1%增加到17.4%,而15—24岁的青年人是失业人群的主要部分。<sup>[5]</sup>到90年代,失业人口进一步增大。1997年,根据“伊朗数据中心”的报告,15—64岁之间劳动力人口的失业率是13.1%。<sup>[6]</sup>不少大学生毕业后步入失业的行列,日益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从事清洁工、服务生、小摊贩等行业的人,很多属于季节性打工,成为城市中的半失业阶层。他们一般学历较低,很大一部分是从农村流入城市的人口。这些人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居住在条件恶劣的街区,其子女也得不到平等的教育机会。另外,大量隐性失业人口(主要是无报酬的家庭工人)、离家出走的妇女、残障者也成为这个阶层的组成部分。他们一般是伊朗社会中的最低收入阶层。

第五,农村社会分层呈复杂化趋势。革命前,巴列维国王已经进行了不彻底的土地改革,革命本身及其后的土地政策继续影响农村社会的变化,这主要体现在:(1)形成一个较为广泛的小土地所有者阶层。革命还未结束,就有不少地区的农民自发抢占逃逸地主的土地和无主荒地,并立即进行耕种,以示对土地的所有权。1986年,政府承认了大约12万农户自发占有的80万公顷土地的合法性。除此之外,政府继续推进土地改革。到1991年,大约60.2万公顷的国有土地和牧场被分配到10万农户手中。另外,约68.1万公顷的临时性耕地被分配给13万农户。<sup>[7]</sup>大部分农户的耕地占有面积一般不超过10公顷,导致小土地所有者数量进一步增加。(2)地主阶层得以保留下来。革命后伊朗的土地改革是很不彻底的。保守派认为:土地收归国有或容许农民抢占土地,破坏了伊斯兰教保护私有财产的原则,应该予以制止。以“监护委员会”为首的高层宗教人士屡次否决议会进一步的土改方案,最终令土改搁浅。到80年代中期,随着两伊战争的进行,土改实际已经停止。因而,地主阶层不仅没有消失,反而继续成为农村中的权势阶层。(3)农业资产阶级队伍有所扩大。一部分获得土地的农民以及保留土地的地主,在政府优惠政策的刺激下,进行机械化耕作、雇工及商品化生产,成为农村中的资产阶级。在城市资产阶级数量锐减的情况下,

农村资产阶级的数量却相对有较大的增长。(4)由于土改的有限性,无地少地的农户构成农村的贫困阶层。实际上,革命后土改受益人群仅占全部农民的6%,仍有为数不少的农民无地或者仅有少量的土地。(5)农业工人队伍有所壮大。革命后政府支持农村发展,修建大量基础设施,这为很多农民找到了新的职业(主要指建筑等行业)。他们同农场工人共同构成农村的工人阶层,而一般不完全脱离农业生产。(6)出现了一个由服务于当地农村的行政管理人员、教师、医生等国家雇员组成的阶层。他们的收入一般高于本地农民,属于农村社会的中上层。农村社会分层的复杂化为其内部贫富分化的加剧奠定了基础。

第六,革命后的伊朗还存在一些由军事及准军事组织组成的强制性部门(如伊斯兰革命卫队),主要服务于国家安全和军事目的。这些部门的上层享有很大的特权,而中层官员、专家和技术工人则相当于中产阶级,普通职员类似工人阶层。处在最底层的普通士兵,成分复杂,主要来自社会中下层。两伊战争中人数激增;战争结束后,大量军人复员,重新融入社会各阶层中。这也是导致90年代后伊朗失业率更加严重的重要原因。

### 三、对革命后伊朗社会分层结构特征的反思

总的来说,同革命前相比,这一时期伊朗的社会分层结构出现新的特征,主要体现在:

第一,什叶派宗教信仰是革命后伊朗立国基石,它深入到国家各个层面,对社会分层也产生了强烈影响。除了宗教人士成为居领导地位的社会阶层之外,同其有密切关系的阶层也上升为社会的上层。由于这一阶层带有保守性、极端性的特点,也使得革命后伊朗的内外政策出现保守极端的倾向。

第二,革命后的伊朗把资产阶级看成贪婪腐败的代名词,认为其违背了伊斯兰教基本精神,因而存在强烈的反资本倾向。这导致资本大量萎缩,资产阶级和产业工人数量的减少。虽然在1989年之后,资本关系得以恢复,但是始终没有达到革命前的状况。而个体经营者数量的急剧增加对现代资本化经营模式来说是相当不利的。

第三,国家在形塑社会分层上起到了重大作用。国有化的重要后果是国家职能的急剧扩大。国家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并深入到各个领域,大量人口成为领取国家薪金的雇员。成为国家雇员,意味着稳定的收入和较高的福利待遇,这就增加了相关阶层对

国家的依附性,并容易导致同一阶层在共同利益上出现割裂。如国企工人同私有企业的工人相比,具有较好的经济地位,因而立场比较保守。而传统中产阶级同政府联系密切,因而同私有企业的中产阶级立场十分不同。这也是革命后伊朗的社会运动比较分散孤立的重要原因。

第四,经济危机导致几乎所有阶层的生活水准下降。在1978—1988年间,伊朗实际产出和投资分别以每年1.8%和6.6%的速度下降,而人口的增长率一直在3.2%~3.9%之间,从而导致人均产出不断下降。<sup>[8]</sup>一直到90年代末,也没有恢复到1977年的水平。更为严重的是通货膨胀率一直都保持在20%以上,这几乎影响到所有阶层的生活水准,尤其中下层居民更受打击。根据伊朗一位计划与预算部门的专家估计,在80年代,大约60%~7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sup>[9](P198)</sup>

最后,分化严重仍然是伊朗社会最重要的特征。在经过短暂的革命洗礼之后,伊朗社会又重新拉开了差距。同普通民众相比,少数特权宗教阶层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享有更多的利益。一些所谓的慈善机构如基金会和清真寺,本身便是垄断性经济实体,也是最有权势的集团。政府绝大部分补贴都进入国有部门和基金会组织,并为其上层所把持,普通民众获益很少。据报道,1987年,收入最低的10%仅获得国民收入的不到1.3%,而最高的10%却获得了33%。根据另一项报道,1988年,大约国民收入的50%都流入10%的人的腰包,另外38%被占人口比例40%的中等阶层获得,而占人口比例40%的最低阶层仅获得了12%。大约有6万个家庭的月收入超过300万里亚尔,而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的月收入仅3万里亚尔。<sup>[9](P201)</sup>在私有化改革后,政府减少了补贴,放开了价格控制,导致通货膨胀恶化,下层民众受害尤甚。而特权者不仅很少受到伤害,还往往利用不健全的市场机制牟取暴利,从而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和贫富分化的程度。

总的来说,革命后伊朗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并

## An analysis of iranian social hierarchical structure after islamic revolution

HAN Jian-wei

(The Middle East Research Institute of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Abstract:** The Iranian social hierarchical structure has changed greatly after revolution because of a series of factors, which was characteristic of return to tradition, anti-capitalism trend, comprehensive national intervention and serious polarization on the whole. This situation was totally incompatible with the original ideal of Islamic revolution and threatened the legitimacy of the Islamic regime. The study is significant to understand Iranian long-standing political and social crisis after revolution.

**Key words:** Iran; Islamic revolution; social hierarchical structure

不符合伊斯兰革命致力于社会平等及公正的理想宗旨,而目前危及伊朗政治稳定的重要根源就在于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分层状况。改善并提高某些阶层的处境和地位,促进社会分层的合理化,是当前伊朗政府面临的重要任务。

### 参考文献:

- [1] 李强. 试析社会分层的十种标准[EB/OL]. (2008-12-20). <http://guancha.gmw.cn/show.aspx?id=5787>.
- [2] GRANT FARR. Modern Iran: A Volume in the Comparative Societies Series [M]. Boston, Mass.: McGraw-Hill, c1999.
- [3] FARHAD NOMANI, SOHRAB BEHDAD. Class and Labor in Iran: Did the Revolution Matter? [M]. Syracuse, N. 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4] SOHRAB BEHDAD, FARHAD NOMANI. Workers, Peasants, and Peddlers: A Study of Labor Stratification in the Post-Revolutionary Iran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2002, 34(4): 667-690.
- [5] ALI MOHAMMADI. Iran Encountering Globalization: Problems and Prospects [M]. London: RoutledgeCurzon, 2003: 173-174.
- [6] HAIDEH MOGHISSI, SAEED RAHNEMA. The Working Class and the Islamic State in Iran [M] // Leo Panitch. Working Class Global Realities: Socialist register 2001. London: Merlin Press; Halifax, N. S.; Fernwood, 2000: 197-218.
- [7] ALI SHAKOOLI. The State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Post-Revolutionary Iran [M]. Basingstoke; Hampshire; New York: Palgrave, c2001: 70.
- [8] M. HASHEM PESARAN. Economic Trends and Macroeconomic Policies in Post-Revolutionary Iran [M] // Parvin Alizadeh. The Economy of Iran: Dilemmas of an Islamic State. London; New York: I. B. Tauris, 2000: 63-99.
- [9] HOOSHANG AMIRAHMADI. Revolution and Economic Transition: The Iranian Experience [M].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责任编辑 刘欢]